

数据社会主义

李三虎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校刊部, 广东 广州 510070)

摘要: 当今时代, 大数据兴起被认为是一场革命, 在技术上表现为从一般信息存储转向数据精准分析, 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从因果关系优先转向相关关系优先, 在改造世界方面从基于工具符合目的的小规模行动转向基于价值预测的大规模行动。这些变革性展望已经引起了一场新一轮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争。在这场争论中, 数据社会主义叙事展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断言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总体趋势。当然, 在大数据时代, 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需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 而是可以在掌控市场变化甚至社会发展方面充分展示其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庞大组织信息网络系统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 能够把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资源, 以大数据预测功能达到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侧数量扩张之间的自我平衡。大数据技术的社会主义建构, 要按照这种对数据社会主义的价值设定, 提高大数据的规模、流转活力与预测精度, 同时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大数据应用的透明化、公正化和有序化发展。

关键词: 大数据技术; 数据资本主义; 数据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7)06-0001-09

“大数据”(big data)这一术语, 用以描述当今时代的海量数据现象。通过对各种海量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 它能为我们提供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途径。2015年5月, 习近平在给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当今世界,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 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1] 数据已经成为战略性资源, 谁拥有更多数据, 谁就拥有未来。面对这种形势,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如何以大数据这一资源建构未来的世界发展? 这些问题需要从不同侧面加以回答。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 欧美学者启用的意识形态术语, 已从信息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转向“数据资本主义”(data capitalism), 以此展望新的世界前景。《数据崩塌》(该书中译本为“《数据新常态》”)的美国作者克里斯托弗·苏达克, 把数据资本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历史的“奇点”: “我们将从一个以资本为财富和权力基础的世界, 步入一个以数据为财富和权力基础的世界。1万年前, 财富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直到1850年代, 这种情形随着工业革命而改变, 资本成为财富的基础。这个基础同样也将遭到大面积崩塌。未来15年, 世界焦点将发生从资本到数据的大变移。”^[2]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奇点”预测意味着, 依靠大数据重塑资本主义。它不仅允许人们预测消费者将要做什么(预言式技术), 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未来行为(劝诱式技术), 告诫人们“不拥抱大数据毋宁死”。这一绝对命令表明, 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数据分析正在引发一场大数据革命, 个人数据将取代资本成为数据资本主义的全球通行货币, 传统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模式不再适应大数据资源的争夺要求。如果不能主动介入大数据引发的指数增长新常态, 那么就只能在数据生存中遭到颠覆性破坏。

收稿日期: 2017-08-14

基金项目: 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 2017 年度委托研究课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世界意义”(17DJ03)

作者简介: 李三虎(1964—), 男, 山西长治人,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教授, 校刊编辑部主任, 《探求》杂志主编, 博士。

就在人们以数据资本主义拥抱大数据时代时,另外一种展望世界前景的声音也出现了。这种声音表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资本本质不会改变,它倾向于把一切变成商品,包括数据。在某种意义上,数据就是信息。在资本积累要求下,信息的整个商品化逻辑,是把作为资源的信息转换为作为商品的信息,做广度和深度开发以及市场扩大。这种态势并不如乐观主义者所展示的全都是好事,也包含着某些矛盾和危机。张韵在评价美国学者丹·席勒《信息拜物教》一书时认为,围绕信息建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蕴含的危机,“不仅体现于 21 世纪初期互联网股票泡沫的破灭,更伴随着信息商品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以及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利差距已然对民主本身所构成的威胁”^[3]。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中国鉴于自身的需要以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姿态已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构逻辑接轨。这意味着中国大量人口的社会需要也被纳入信息资本主义跨国的资本积累范围。如今大数据作为信息也成为资本重组的重要资源,我们需要从全球视野审视中国日益被裹挟进数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与未来。张韵就此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使自身成为当前世界最大的大数据产业市场,在数据经济繁荣的背后,在政策的制定和推广的过程中,在将数据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我们最不应该忽视的是数据经济背后商品化逻辑的历史及其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延展——数据资本主义,以及由此引发新的数据鸿沟——个体与机构之间关于数据隐私与数据开放的伦理问题,以及数据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利差距。”^[3]

的确,中国已经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作为创新驱动的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一战略引导下,面对资本全球化体系,相对于数据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数据社会主义形态?数据社会主义应该体现何种中国特色?着眼于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大数据的变革意义给予概括,然后对大数据的社会主义起源之争给予评价,由此推进数据社会主义特征化,在此基础上就大数据技术的社会主义建构给予适当展望。

一、大数据技术兴起与世界变革

计算机、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正成为各个产业和经济部门运营和发展的引擎。但是,这个引擎正面临着大数据的巨大考验。各种业务数据以几何级数增长,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产生 1TB 交易数据,推特每天生成超过 7TB 数据,脸书每天产生 10TB 数据,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大型强子对撞机每年产生约 15PB 数据。从全球数据生产来看,人类正在从 Byte(8bit)、KB(1024Bytes)、MB(1024²KB)和 GB(1024³B)的小数据量级,进入 TB(1024⁴B)、PB(1024⁵B)、EB(1024⁶B)、ZB(1024⁷B)和 YB(1024⁸B)的大数据量级时代。传统数据处理技术不再适应要求,必须要谋求大数据技术发展。

大数据技术,主要包括数据存储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两大类。对存储技术,建立在数据关系模型基础上的 SQR(结构化查询语言)数据库,已经无法满足海量结构化数据存储要求,对于半结构化甚至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更是显得无能为力。由此在技术上开始转向可选择的数据存储模型——NoSQL(非结构化查询语言)数据库建立。目前市场上已有 150 多种 NoSQL 数据库,包括关键价值存储、文件存储、可扩大纪录存储和图形存储等。除 NoSQL 数据库,还有内存数据组织、数据集成、数据准备、分布式文件存储和数据质量模型等也处于开发中。存储技术只是大数据技术的一部分,数据分析技术对于大数据而言甚至更为重要,包括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预测分析模型、知识搜索和发现、数据流分析、神经网络和社会网络绘图、数据可视化工具等。人类必须要拥有相应的软件和硬件支撑,才能致力于存储和分析海量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以便从大数据使用中发现新的发展机会和价值拓展。

从发展态势来看,大数据因信息技术而生,大数据技术因大数据而生,因此大数据技术不过是信息技术的深度延伸。数据是合理的数字编码与背景知识,是信息的科学表达。人们用“大数据”,要表达的是

规模庞大(volume)、来源多样(variety)、采集传递在线及时(velocity)和高商业价值(value)的所谓4V数据。这些对大数据的特征概括,显然只是表面的商业管理现象。既然说人类正面临一个大数据时代,那大数据时代必定是一场革命。大数据革命是以不可置信但又可能的海量数据实现各种经济社会目标,发展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能力、把一种业务模式应用于似乎毫不相干的领域的知识和价值、对与数据相关的领域那怕是承诺改善百分之一的坚守等等。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善于创造以往从未有的可能性,通过数据赋能并相信我们能从大数据中发现未被发现的东西,把工商领域乃至社会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对大数据革命,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三个特征。

1. 大数据革命是数据分析技术的变革,是从小数据统计到大数据精准分析的技术变革。大数据,必须要以“大分析”为支撑。否则,大数据就只能是数量巨大和杂乱无章。正如统计分析软件(SPSS)创建者之一诺曼·尼指出:“‘大数据革命’的黎明,把我们带到数据分析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独特时刻,使以往小数据处理传统相形见绌。这场革命不是理论的突破,也不是琐碎的变化,它代表着一种能够在效率、生产能力、税收和盈利方面实现巨大收益的真正跃进和清晰机会。大分析的时代意义,恰恰也就在这里。”^{[4]7} 数据分析技术古已有之,比如财产纪录、财富计算、人口统计、赋税管理等;近代以来,为了推进自然界数据化更是产生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数理统计等手段,由此不断带来科技革命。以传统工具为基础的数据分析源于实验设计和因果推理,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员力图以自己建立的数学模型实现统计显著性的最大化。但是,与传统小数据统计不同,“大数据要求我们超越推理和统计数据显著性,走向有意义的精准分析”^{[4]7},也即要求大分析。大分析的核心优势,是针对代表大多数的大数据集(dataset)进行不偏不倚的精准分析。大分析意味着较大的准确性、透明性和预测性,各个经济部门的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员具有对大数据集的计算能力,从中发现新的机遇和需求,揭示形势变化,改善绩效和提高预测能力。

2. 大数据革命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从因果关系优先到相关关系优先的思维变革。在小数据时代,数据是稀有资源,人们一般会把相关数据当作秘密加以守护。实验数据,个人消费数据,都是作为稀有资源留在小众人手里。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生活在数据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数据都存储在网络中,存储在云端里,因此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数据海洋”^[5]。在这种数据的海洋里,人们更愿意自由地挖掘、获取自己所需数据,更愿意在网络中晒出自己的一切,与人们共同分享。《大数据》(中译本为“《大数据时代》”)的美国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时代,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与世界的互动方式提出挑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社会将要摆脱那种对因果关系的痴迷,转向简单的相关关系: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这种现象颠覆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实践,挑战着我们对如何决策和领会现实的最基本理解。”^{[6]89} 这种论述并不是一种二元论思维方法,而是强调相关关系优先于因果关系。我们从大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模式,大数据表明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分析数据提供新颖而宝贵的决策建议。例如,成千上万的电子病例表明癌症病人以橙汁服用阿司匹林有利于缓解病痛,因此寻找改善健康状况的准确原因相对于病人的生命延长来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同样,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只要知道什么时间是购买便宜机票的最佳时刻就足够了,不需要理解机票价格疯狂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把因果关系优先于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颠倒为相关关系优先于到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

3. 大数据革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变革,是从工具符合目的的小规模操作转向基于价值预测的大规模行动的世界改造变革。大数据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改造方法的开端。正如望远镜使我们理解宇宙和显微镜能使我们了解细菌一样,用以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的大数据技术也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和改造世界。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能使人们在大规模上做到小规模上做不到的事情,人们由此以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途径,取得新的能力或创造新的价值形式。”^{[6]89} 大数据革命的真正意义不是用以计算数据的机器或技术本身,而是数据本身,是我们如何使用数据——利用大数据,基于价值预测变不

可能为可能的大规模行动。

二、大数据的社会主义起源之争

“大数据”这一术语，横跨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或经济计量学领域。1990 年代中期，约翰·马西在硅谷图形公司(SGI)午餐桌谈话中，首次提出大数据概念。随后魏斯与英德加以及迪博尔德，分别在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意义上对大数据给予最早的学术论证。高德纳公司的道格拉斯·兰尼，于 2001 年在一份未发表的研究笔记中，从内涵上丰富了大数据概念，大数据概念随之流行起来。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使用的电脑、手机、可穿戴设备，再加上无线互联网，人类处理数据的技术能力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强大，人类的市场需求及其相关信息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容易地被汇集和处理。这样人们围绕未来的国家或政府是否会有拥有更为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问题，掀起了新一轮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争。

早在从 1930 年代就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一位“意识形态斗士”，就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如果不能像自由市场价格体系那样收集和分析用以指导市场行为的符码化知识或信息的话，那么最终会归于失败。1970 年代初期，在智利开展的一次社会主义试验，正是要力图解决计划经济的核算问题。1970 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后，面对上届政府留下的一片混乱矿山和工厂，号召国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国家重点产业国有化。他为此任命费尔南多·弗洛雷斯负责统筹国有化发展事务。弗洛雷斯作为当时“控制论”的追随者，注意到社会主义与控制论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趋同关系，随邀请英国控制论大师斯塔福德·比尔打造一种由电报机构成的超现代信息系统，以便把智利社会主义带进计算机时代。这一系统被命名为“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实际上就是一台超级“计划机器”(Planning Machine)。该系统能够实时地将数据从智利国有工厂传输到位于圣地亚哥的国家电信公司运营中心并输入一个模拟软件，用来监督工厂生产情况，在原材料不足时发出警告。1972 年 10 月，对国有化持有戒心的卡车司机举行全国大罢工。弗洛雷斯在那台计划机器帮助下，鼓励各个产业部门配合，实现燃料共享，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因此，协同控制工程计划，对比尔来说是精致的管理控制论应用，对阿连德来说就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

由于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加上皮诺切特将军于 1973 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哈耶克曾一度成为皮诺切特的经济顾问，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一起在智利开展新自由主义试验)，协同控制工程随被废弃。尽管智利这次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了，但从技术上看，协同控制工程计划与今天的大数据技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尔为这一计划设计的模型，是一个通过传感器、网络和软件互相连接的机器系统，其功能是通过海量数据分析，提醒管理者注意决策的长期后果及其不稳定因素。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最近在回顾智利这段技术政治史时，对比今天的大数据技术指出：“协同控制工程，也可被看作是来自未来的特使。近些日子以来，许多商业出版物和技术研讨活动不断赞美实时动态计划、微小而有力的传感器广泛安置等。在这些技术中，首先是大数据——一个颇富弹性的概念。按照不可阻挡而又难以名状的技术进步规律，即使模糊估计，大数据每年都会翻一番。在许多方面，比尔的控制论梦想——让实时有效地收集和分析信息成为企业和政府共有的信条，最终都已经变成现实。”^[7]出于对该计划的未来意义认同，阿连德和弗洛雷斯对协同工程计划深信不疑。事实上，当时东德和苏联也曾有过类似计划，只是从来没有给予实质性推进。阿连德下台后，管理控制论仍在繁荣发展。适应计算机技术发展形势，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于 1973 年撰写《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一书，认为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有利于解决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出的各种诘难。比尔后来一直倡导信息是一种国家资源，先后在乌拉圭、委内瑞拉、加拿大等国家试图重建协同工程系统，1980 年更是致信向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说明

国家信息网络建设的战略意义。

以上关于大数据的社会主义起源叙事,似乎表明大数据使重回传统计划经济成为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由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自由市场竞争(即“看不见的手”)导致大量产能过剩,所以只要按计划生产产品,按计划配置资源,就可以消除产能过剩现象。也就是说,只要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就会成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模式。但是,计划经济必须要有一只高效的“看得见的手”,才能取得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力图扮演“看得见的手”,但由于并不能完全掌控“看不见的手”的整个信息和知识情况,所以并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但是,人们今天正在积极赋予大数据以“看得见的手”的巨大能力。就连一向奉市场经济为主臬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也强调计划经济需要一个“上帝”来筹划,而这个人类期待已久的“上帝”在今天就是大数据技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更是明确表达了大数据对计划经济的意义,认为“1930年因为人们相信市场中有‘看不见的手’,所以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但是现在我们手中掌握的数据使过去看不见的手得以看见。”因此如果说100年前美国主张的市场经济对前苏联主张的计划经济是一次胜利的话,那么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100年后计划经济将会成为一种更优越的经济系统,“2030年世界将再次掀起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论争”。只要在大数据帮助下弄清楚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之后,我们便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届时将从信息技术(IT)时代进入数据技术(DT)时代。学者秦宣就此认为,大数据技术基于相关关系的分析和预测,将使自下而上的科学规划提前编制取代传统行政化决策成为可能,也即“大数据将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成为可能”^{[8][11]}。

与此同时,人们也以大数据技术为前提展示资本主义商业世界的“计划经济”特征。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是自发的,市场运行需要付出交易成本,企业必须要降低交易成本才能生存下来。企业越大,交易成本越高。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没有大企业,因为技术水平达不到。随着技术进步,企业交易成本越来越低,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跨国公司随之出现。今天大数据技术进步,更是把人类计划的边界大大拓展了。正是因为如此,今天那些网络资本主义寡头开始设计、开发和使用中央自动化计算商业模式,利用数据为更好的商业决策提供参考和服务。脸书以190亿美元收购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意在掌控倾向于使用移动通讯的年轻人市场偏好数据库。谷歌建立了一个覆盖全世界的应用程序帝国(如地图、视频、邮件、教育、聊天等),以便控制各种数据集。特别是优步以大数据众包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巨大司机数据库,为乘客匹配出最合适司机,确保交通供需的市场自我平衡。这种以商业智能平台为基础运营的商业模式,在美国已经逐步扩大到科学研究、医疗、国防和智能操作等领域。这种把商业模式向政府决策的空间拓展,与其说是源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和数据控制需要而展示了数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毋宁说是资本主义正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越来越表现出“计划经济”特征。

新一轮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争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人们不再完全把计划置于市场的对立面加以对待。即使是“复兴传统计划经济”的激进言论,也给市场配置资源留有相当余地。至少到目前为止,大数据技术还不足以使计划取代市场成为决定性资源配置方式。大数据只能部分地使计划起到有效配置资源作用,因为一方面所谓商业智能平台包含的计划配置资源机制是大数据技术事后事情,大数据技术事前事情,如平台技术研发、建设、维护和升级仍然需要市场对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计划以大数据为前提,但大数据本身源于市场用户,如手机导航数据源能够显示何种路段拥堵,其来源是装有导航的用户手机在相关路段的行驶速度,这样每个人既是路况信息的使用者又是信息的发送者。无论如何,今天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争,启示我们必须要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置于大数据时代加以思考。

三、数据社会主义的特征化梳理

以上考察表明,大数据技术运营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特征的智能商业模式,展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断言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总体趋势。对于这一趋势,秦宣以大数据影响人类社会进程为前提表明:“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在大数据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同朝着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由此可以说,大数据开辟了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8]13}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表明,计划和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在。例如,“中国国内目前使用的订单农业以及某些制造业实行的‘私人定制’,就带有计划性”^{[8]11}。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强调可以返回到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数据虽然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和预测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必然地保证传统计划经济整体上的有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纠结于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身的特殊制度优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9]。这种本质性的最大制度优势,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庞大组织信息网络系统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这里所谓数据社会主义,就是以这种能力适应、把握和引领大数据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共享。

1. 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优势,促进大数据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大数据是每个人的大数据,是每个企业的大数据,更是整个国家的大数据。大数据对国家具有广泛综合应用价值,日益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2013 年 7 月,习近平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指出:“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把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网络强国和数据强国,是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物质基础,主动把握大数据发展的新契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建设发展要求。大数据技术是国家多行业、多领域的共同任务,贯通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等各个方面。把数据主权纳入国家核心利益,必须要加快大数据立法,用大数据加速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大数据加快政府改革,利用大数据实施监管和反腐,以大量优质数据为社会提供更好公共服务。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顶层设计上推动大数据有效发展,形成大数据发展的举国和市场体制优势。

2.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依靠大数据实现供给与消费之间的自我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产能短缺,所以生产什么往往是生产者说了算,消费者只需按照需求决定买或不买。随着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对产品质量、生活环境有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转向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侧数量扩张之间的自我平衡,即适应国民生活和收入水平提高后对中高端产品和高质服务的迫切需求,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重点解决当前供给需求错位、产能过剩、科技创新短板等问题,推动结构性经济均衡发展。大数据,在经济层面已成为打造新动能的关键要素,在行业层面已成为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如学者王庆林认为:“大数据和云计算让从消费需求入手的供给侧改革更具可操作性,为中国这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供给的平衡提供了良机。”^[10] 消费数据及其处理将使企业按照消费需求进行,让企业在生产每件产品之前知道消费者是谁,知道这件产品的生产标准,也即实际上是让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充分和善于运用大数据,深入挖掘消费数据的市场价值。大数据发展只有面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得到可靠的巨大支持,数据成果的尽可能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将成为供求双方共同的强烈愿望。加快全球数据挖掘和整合进程,让更多的企业和部门在各个领域为全球大数据的整合编写接口,极大地提高我国参与全

球经济与社会治理的效率。

3.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大数据开放和共享发展。从本质上讲,大数据要求信息开放。大数据作为非物质产品,具有开放性、共享性,具有通过消费而不断增殖的公共权益特征。与资本主义相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发展和应用大数据,强调数据共享经济,致力于消除数据鸿沟。大数据分散在云计算平台上,标志着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历史将真正成为人民创造的历史。1978年,邓小平提出让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人民群众认同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要求。我国14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决定了中国大数据规模为全球最大。据预测,2020年,全球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将从2015年的1403亿美元达到10270亿美元,我国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为将从2015年的1692亿元达到13626亿元,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9%达到53%。大数据时代必将出现千百万个新型民营企业家,他们将创造的财富与社会分享,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满足个人价值要求。大数据发展尊重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和期盼。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大数据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新创业中来,实现共享经济。自2014年来,快的打车或滴滴打车以及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雨伞等滚滚而来,让分享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经济社会特征。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在论及中国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时指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11]

四、大数据技术的社会主义建构

以上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义,赋予大数据发展以现实的社会主义价值或意义。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模、流转活力与预测精度等,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结合数据社会主义的价值或意义设定,大数据技术的社会建构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

1. 构建公共大数据库建设。大数据是全数据,包括互联网存储数据、政府数据和行业数据。促进大数据技术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开发,加快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大数据开放和共享发展。持续推进新一代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公共无线网络、电子政务网、行业专网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建立监测、公众民情、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政府管理绩效考评、资源统筹与经济预警监测等各层面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国家基础数据开放共享进程,整合政府、企事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信用信息资源,打通信息横向和纵向的共享渠道,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利用大数据预测宏观经济形势,提高对经济形势判断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做好大数据与工业宽带建设对接,建立完善的工业互联网体系和工业体系。

2. 支持和鼓励大数据产品或平台研发。大数据如同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中国是网络大国,互联网规模全球第一,宽带规模全球第二,12亿以上手机用户,博客、微博和微信用户总数超10亿。在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下,数据挖掘如同新型能源开采,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目前我国人口要素红利退却,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日益成为发展瓶颈。必须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把大数据作为新的战略性生产要素释放出来,激发基于大数据资源进行创新创业的热情,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大数据正在孕育出更多的经济新业态,与数据有关的新业态持续高速扩张。例如,各种交通查询手机软件以及APP开发行业兴起,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云医院”行业发展,网络金融或电子金融崛起,基于个人浏览网页与消费数据的商品推荐和快递服务行业方兴未艾,等等不一而足。把握这种新业态发展趋势,在“互联网+”行动计划引领下,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研发各种大数据平台或产品,通过大数据实现信息技术与相关行业深度融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注重大数据的安全与伦理治理。大数据不仅是技术开发及其应用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数据开放和共享,特别会涉及部门、行业或企业以及个人的机密、秘密和隐私保护。所谓大数据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审慎分析开放共享后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数据隐私和数据保护等问题,对于能够促进效益提高、价值发挥和共同交流的数据应该鼓励开放,对涉及个人隐私、产业核心机密甚至国家战略安全的数据应该加强保护。

在国家层面,国际竞争焦点正从资本、自然资源和能源争夺转向大数据争夺,制数权成为国家新制权。大数据造就的数据强国与数据弱国之分,源于一国的大数据能力优劣。美国政府与互联网、大数据领军公司结合,正在建构着新的数据情报联合体,它对全球数据空间的整体性监控实际上构成了“数据霸权”。美国的“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监控各国首脑、政府、官员乃至企业和个人,实际上造成了对他国的“数据威胁”。大数据安全,必然影响到国家战略安全。我国各种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机构承载的庞大数据,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目标。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规划“大数据战略”中,必须要着眼于核心技术优势,推进大数据开放和安全方面的相关立法与标准制定,针对国家重要网络基础设施实行国家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在商业层面,企业制胜的关键是获取通信、金融和买卖数据流,海量数据将取代专利、商标和版权等成为最为重要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战略正在蜕变为大数据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立法上扩大商业机密保护范围,完善数据侵权的认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构建数据删除权利保障制度,建立完善云计算评估、监控中心和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机制。

在公民个体层面,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成为新的社会治理诉求。相对于政府和企业,个人对自身数据所享有的所有权、知情权、采集权、保存权、使用权和隐私权等公民新权益,是否会遭到滥用必然成为一个新的伦理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蒋洁等人就这一问题指出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的四种情况^[12]:一是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从网上网下的巨量零散数据中分离识别主体隐私信息,这将会严重影响到参与者的自主选择与自愿表达;二是大数据分析的预测功能导致整个社会对相关分析的盲目信任,这将严重侵害参与者不受差别对待的平等权益;三是过于专业化的大数据技术垄断通过挖掘数据隐私牟取巨额利润,这将严重侵害权利人的知情同意权;四是大数据分析的高额利润和巨大价值增益使资本雄厚的挖掘主体长期把持数据市场,这将会剥夺社会主体获得公平发展机会和发展权益。这些情况正在使许多受损群体减少直接参与数据活动的频次与力度,甚至对抗数据收集和分析,从而不利于互利共赢的巨量数据开源集成平台开发和建设。因此为了“寻找大数据生态系统有序发展与实现人类文明期许的最优平衡点,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尽快完善有利于实现数据自由平等与公正法治等价值共识的调整原则体系”^{[12]201}。我国实施大数据战略,以大数据助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须要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相应政策法律规范和机制,确保数据的自由储流、公平挖掘与各参与方共享收益,最终实现大数据应用的透明、公正和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EB/OL]. [2015-05-23].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5/23/c_1115383959.htm.
- [2] New Trends Domains. Datacapitalism, come[EB/OL]. [2016-6-24]. <http://www.newtrendsdomains.com/datacapitalism.com>.
- [3] 张韵. 从“信息资本主义”到“数据资本主义”——重读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EB/OL]. 热风学术网刊, 2016 (1). [http://cul.shu.edu.cn/Default.aspx?tabid=34718&ctl=Detail&mid=64563&Id=195440&SkinSrc=\[L\]Skins/whyj/whzx1](http://cul.shu.edu.cn/Default.aspx?tabid=34718&ctl=Detail&mid=64563&Id=195440&SkinSrc=[L]Skins/whyj/whzx1).

- [4] NIE N H. The Rise of Big Data Spurs a Revolution in Big Analytics[EB/OL]. [2016-03-09]. <http://www.revolutionanalytics.com/sites/default/files/the-rise-of-big-data-executive-brief.pdf>.
- [5] 黄欣荣. 大数据技术的伦理反思[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 47.
- [6]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7] EVGENY M. The Planning Machine: Project Cybersy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ig Data Nation[J]. The New Yorker, 2014-10-13.
- [8] 秦宣. 大数据与社会主义[J]. 教学与研究, 2016(5).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7-01].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_t_t_t=0.23941985773853958.
- [10] 王庆林. 供给侧改革下的新计划经济——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思考[J]. 商场现代化, 2016(7): 238.
- [11] 习近平.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2-17.
- [12] 蒋洁, 卫承霏, 何亮亮. 大数据集成的权益危机与价值回归[J]. 科技管理研究, 2016(2): 200-201.

Data Socialism

LI Sanhu

(Department of College Journal, Party School of CPC Gu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Guangzhou 510070,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the rise of big data is regarded as a revolution, which is oriented in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from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storage to the precise data analysis, in the preferential mode of thinking from the causation to the correlation, a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little data computing operations that tools conform to goals, to the mass actions based on value forecasts. These transformational outlooks have been leading to the new round planned-market economies debate, where the narrative of data socialism shows the overall trend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that classic Marxists asserted.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realistic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es it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control the market changes and even social development without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pends on its own larg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to form the ability of mobilizing resources to accomplish large undertakings, considering big data as 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achieving the self-balance between the reformed supply-side structure and the demand-side expansion with the forecasting function of big data. So constructing socialistically big data technology is to improve the size or scale, circulation vitality and prediction accuracy of big data, aimed at the value of data socialism, and to actualize the transparency, justice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big data technology; data capitalism; data socialism; socialist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黄仕军)